

## 西方學界對抗日戰爭史的反思與重述

● 嚴海建



方德萬 (Hans J. van de Ven) 著，  
胡允桓譯：《中國的民族主義和  
戰爭 (1925-1945)》(北京：三聯  
書店，2007)。

方德萬 (Hans J. van de Ven) 是英國劍橋大學第十任漢學教授，兼任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院 (Faculty of Asia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院長，是著名的中國歷史研究學者。方德萬長期致力於中國近代軍事和抗日戰爭的研究，現作

為《劍橋世界戰爭史》的撰寫人之一，負責該書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國部分的編撰。他的專著《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 (1925-1945)》(*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以下簡稱《民族主義和戰爭》，引用只註頁碼) 於2007年夏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中文版，對我們了解西方史學界對抗日戰爭史乃至中華民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很有助益。該書以戰爭與民族主義為主題，採用了長時段的考察方法，對於我們以往的很多認識有糾偏的作用，在方法論上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反思的地方。筆者不揣鄙陋，以下試就三個方面做簡單評述。

### 一 從中國社會自身尋找答案

對於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國際學術界向來有「中國中心觀」與「國際化視角」之爭。其實，觀察問題的視角不應該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多重視角下的研究可以揭示歷史的多重面相，從而更接近歷史真實。抗日戰爭無疑是中國自身的作為與外在各種因素糾結在一起的最為典

方德萬的專著《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戰爭 (1925-1945)》以戰爭與民族主義為主題，採用了長時段的考察方法，對於我們以往的很多認識有糾偏的作用，在方法論上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和反思的地方。

蔣介石政府在戰爭後期所面臨的困難，也許只有一部分是由其自身體制及政策上的弊端造成的，更多的應該源於戰爭的持續以及中國社會經濟自身存在的種種不可控的原因，而這些無法控制的因素往往又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型的歷史過程。我們以往的研究長期受國共之爭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往往忽視抗戰之主體——國民政府。當然，這只是認識的誤區之一，另外一個誤區就是方德萬要糾正的所謂「史迪威—白修德模式」（頁426）。以往歐美學術界在論述抗戰前夕和抗戰期間中國政府的作用時，多採用這一模式，把目光更多投向中外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認為抗戰之成敗更多取決於盟國特別是美國的支持力度，以及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局勢的演變，而不是國民政府本身的作為。方認為應從中國社會自身來尋求答案。在方的敘述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國民政府成為敘述的主體。敘述主體的轉換是極其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察中國社會自身在抗戰語境中的種種可能與不可能。當然，內部取向的考察並不排斥國際化的視角，方的研究將二者很好地結合起來了。

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等提出的「西方衝擊—中國反應」的模式暗含有西方主動與中國被動、西方先進與中國落後等價值判斷預設在裏面，以此來看現代中國的歷史遂引發諸多的問題。表現在對抗戰的認識上，突出的問題就是中國抗戰對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意義，以及中國抗戰勝利是源於自身的努力還是外在的形勢。很長一段時間，西方學界認為，中國戰場對於太平洋戰爭的貢獻有限，往往將中國戰場視為盟軍戰略的受益者。上述的判斷體現了西方中心主義的主觀性，忽視了中國社會本身的諸多因

素。方提出，西方學術界應該重新審視和評價中國抗日戰爭。方著一方面肯定了中國戰場的持續抵抗對於二戰東亞戰場的積極貢獻，另一方面強調了中國戰場的持續抵抗更多是出於中國社會自身的支持而非單純依賴國際援助。

通常，我們會有一種錯覺，那就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在亞太地區形成了蔣介石政府一直期望的國際反法西斯聯盟。表面看來，中國抗戰的國際環境得以改善，可以獲得盟國的援助，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戰局的惡化、交通線的斷絕，導致中國實際獲得的援助非常有限，而且運抵的部分物資也大多是被盟國部隊消耗掉。另一方面，從盟軍的戰略角度來看，正如方看到的那樣，「國民黨成為美英的盟國。這一進展確保了最終戰勝日本。可是國民黨為進入盟國所付出的代價確是實實在在的。無論是美國還是英國都不希望使中國自身成為行動的主要舞台。」（〈序言〉，頁29）中國不但未能從反法西斯同盟這樣的國際合作框架中獲得更多，甚至很大程度上其犧牲遠大於獲得的援助。由於盟軍的戰略有一定的利己性，它們在戰略行動中更多考慮的是如何利用中國戰場的資源為其戰略目標服務，甚至不惜犧牲中國戰場的利益。

受「史迪威—白修德模式」的影響，我們以往對戰爭後期蔣介石政府的表現之評價大多是負面的。但蔣介石政府在戰爭後期所面臨的困難，也許只有一部分是由其自身體制及政策上的弊端造成的，更多的

應該源於戰爭的持續以及中國社會經濟自身存在的種種不可控的原因，而這些無法控制的因素往往又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方認為：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國民黨何以最終未能迎接抗日戰爭的挑戰。與他們自己的信念或者更確切地說與他們自己的希望相反，他們無法在一場消耗戰中拖垮日本。依本人之見，從根本上說，問題不在於無能、缺乏意志，腐敗或集權，而是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無法應對現代戰爭的要求這樣一個現實。(頁427)

在中國尚未實現工業化的條件下，西方那種以工業化為物質基礎的崇尚進攻的戰爭思維對中國是不適用的。面對被迫與工業化的日本作戰而中國沒有任何工業基礎的事實，蔣介石政府不得不順應中國的現實，採取傳統的軍事動員戰略。以史迪威 (Joseph W. Stilwell) 為代表的西方觀點，批評蔣介石政府的軍事戰略保守、消極，實際上是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方提出，要擺脫西方用現代戰爭條件和戰爭方式來考察中日戰爭的思維，從這場戰爭自身的特點、歷史背景，而不是從西方現代戰爭的觀點出發來理解中日戰爭。

由於擺脫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觀念束縛，所以在方看來，中國抵抗日本的軍事行動是傑出的。中國的抗日表明一個社會抵禦外敵的潛力不只取決於軍隊的訓練有素和先進的武器裝備，還取決於中國傳統的文化、政治和軍事資源，比如驛

站、田賦徵實、軍隊屯田等帶有傳統色彩的措施；在西方人眼裏可能是落後、陳腐的做法，但在一個資源有限的農業社會卻可能是開展艱難戰爭的明智方法。方對蔣介石政府在抗戰時期戰爭運行模式的詮釋，是相當有見地的。

## 二 戰爭與民族主義

方德萬在書中提到：

我把戰事和軍事置於國民黨歷史的中心，這段歷史從二十世紀20年代中期作為一個附有武裝力量的革命組織的崛起，直到1945年8月隨日本投降而終止的抗日戰爭，到彼時為止，我相信其失敗雖然不是不可避免的卻是可以預見的。(〈序言〉，頁23)

對國民黨的失敗，方引入了民族主義的分析視角，突出了戰爭與民族主義的內在關聯，特別是抗戰對蔣介石政權的負面影響。

方認為，國民黨民族主義的一項內容是駁斥將中國描繪成一種不尚武的文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西方認為中國不尚武、消極和落後的觀點在中國內部被接受了。到1920年代，軍事資本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都成為必要的權勢資本，軍隊既是國民黨革命的手段，也是他們鞏固政權、實現國內統一的資本，更是實現反帝、抵抗日本侵略最直接的需要。而軍事權勢的發揮是通過戰爭實現的，這樣，戰

中國的抗日表明抵禦外敵的潛力不只取決於軍隊的訓練有素和先進的武器裝備，還取決於中國傳統的文化、政治和軍事資源。在西方人眼裏可能是落後、陳腐的做法，但在一個資源有限的農業社會卻可能是開展艱難戰爭的明智方法。

我們對戰後國民黨中國的理解必須以戰時的中國為背景，看國民黨政權背負着甚麼樣的政治社會負擔進入戰後，其在戰後的國共競逐中在民心上的失分，必須要考慮抗戰對其的影響。

爭與民族主義就有了內在的關聯。我們以往對於近代的民族主義的論述多側重於抵禦外侮的一面，而忽視國家建構的一面。方通過戰爭與民族主義的論述，將民族主義的內外兩方面的訴求聯繫起來，使我們對於民國時代的民族主義獲致更全面的認識。

戰爭往往造就民族，日本的入侵造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這是不爭的事實。民族主義情緒在禦侮衛國時最容易被激發起來，這就是為甚麼在抗戰初起之時蔣介石政府一度獲得社會各階層廣泛支持的原因。但是隨着抗戰的持續，抗戰勝利還需要較長時間的堅持才能獲得，這時民族主義的情緒會從高潮跌落，甚至游離，把期望寄託到其他有希望的政治力量身上。這樣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成了這種民族主義的恩主，因為〔在很多日戰區的基層社會中〕國民黨被趕走了。中國共產黨填補了空缺，將英勇的游擊戰轉向抵抗日本，並將國民黨的無能變成他們建立統治的神話」（頁429）。

作為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的情感與理念是一種可以維繫和鞏固政權合法性的天然政治資源，但這種資源要發揮作用，需要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意識地加以運用和發揮。顯然，中共從戰爭中獲益，成為民族主義的寄託對象，而國民黨在運用民族主義上卻處於一種明顯的劣勢，不是說其不具備民族主義的因素，而是其運用民族主義情緒進行動員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對於內政外交及軍事等一系列

的棘手問題，「執政黨與革命黨由於所處位置不同，承擔的責任和風險也不一樣，因此，當面對重大危機之際，它們所選擇的作法很可能不會一樣。革命黨可以把口號喊得很高很響，因為它不需要承擔執政黨的失敗責任。然而執政黨卻有它的難處。」（楊奎松：〈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比較研究〉，網易新聞，[http://history.news.163.com/09/0629/03/5CUPPN9K00013FM5\\_3.html](http://history.news.163.com/09/0629/03/5CUPPN9K00013FM5_3.html)。）

所以，戰爭帶來的混亂以及各種讓人無法忍受的後果都需要國民黨政權為之負責，承受民意的譴責，這是其戰時主體地位附帶的後果，當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這一切對於蔣介石政權的影響一直延續到戰後。正如方所說的，「戰爭的影響是深遠的」（頁431），這是我們以往最為忽視的一個問題。所以，我們對戰後國民黨中國的理解必須以戰時的中國為背景，看國民黨政權背負着甚麼樣的政治社會負擔進入戰後，其在戰後的國共競逐中在民心上的失分，必須要考慮抗戰對其的影響。

### 三 中長時段的考察

在研究時段上，方德萬對抗日戰爭的研究不再局限在1937至1945年的八年間或者是更為寬泛的1931至1945年之間，而是以1925年國民黨的改組北伐作為考察的起點，將對抗戰的考察基礎放到近代興起的尚武取向和北伐戰爭時期的暴力文

化，從而拓寬了抗戰史研究的視野。從《民族主義和戰爭》具體的篇章結構來看，全書分為七章，除去第一章「重看史迪威」是為了確定全書的立場和視角的轉變外，餘下的篇幅有一半左右是討論抗戰前的中國，可見方對於背景和語境的重建是非常重視的。從具體研究內容來看，方特別注意文本（抗戰中的中國政府及社會也可視為文本）的時代性及置文本於其時代語境之中的必要，應該說，他對語境部分的論述往往打破成說，試圖將抗戰時期的歷史放到更大範圍的社會背景中去考察。

這樣注重語境重建的大歷史意識，體現的是一種長程的歷史觀，注重考察歷史的延續性。其研究的路徑在於：一方面，從宏觀歷史中把握微觀的歷史研究對象，將作為研究對象的「人物」和「事件」置於其所在的歷史語境中，從而拓展微觀研究對於整體歷史認識的價值；另一方面，則是在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的影響下，跳出具體而微的個案研究，強調從較長的時段來觀察歷史，從而對歷史的結構性變動和長期發展趨勢獲致較為清晰的認識。

方的研究兼具上述兩種取徑之特點。他對1925至1945年整整二十年的長時段考察，以及對於戰爭與民族主義這一宏觀主題的探究，與中國大陸史學界日益重視個案研究以及微觀研究的趨勢有所不同，有其特殊的價值。這種時間跨度較大的粗線條勾勒，雖然會使很多細節顯

得不夠清晰，但在一些關鍵的大問題上卻獲得了較以往更為清醒客觀的認識。這也許就是年鑒學派提倡長時段與短時段研究相結合的初衷（當然這可能用「中長時段」表述更準確），確實有很多歷史的大問題需要通過長時段的考察才能獲得較為全面客觀的認識。

較長時段的考察對研究者的知識面和駕馭宏大敘事的能力是一個挑戰。方著的一大特點，就是視野開闊。一般而言，史學研究題目可專，眼界一定要通，眼界通而後可從上下左右不同角度去觀察分析具體的事物和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見到其時代意義。方的論述對於戰前和戰時的軍事、政治、社會以及國際環境等各層面都有涉及，不取按時間序列的鋪敘方式，而自有其內在的脈絡，可見其視野之開闊，知識之廣博，敘述手法之老到。

但是客觀來講，方著在史實考訂和重建的工作上着力不多，因為該書時間跨度較長，主題相對較為寬泛，在史實考訂和重建上更多的是借助已有的相關研究。這是長時段的考察不可避免的，但是方在相關具體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很多新的觀點，這是其難能可貴之處。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的海外學者，方對於中國大陸相關學術研究的成果了解之多，令人嘆服。方著也正因為做到了這一點，才真正地確保了該項研究能在相關研究領域作出屬於自己的貢獻。

總之，從《民族主義和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到歷史研究的多種

方德萬的論述對於戰前和戰時的軍事、政治、社會以及國際環境等各層面都有涉及，不取按時間序列的鋪敘方式，而自有其內在的脈絡，可見其視野之開闊，知識之廣博，敘述手法之老到。

取向的融合與互補，大致可以觀察到三種歷史觀的融合，即國際化的視角、長程的歷史觀和內部取向的歷史觀。方著特別注重地緣政治的因素，對於盟國戰略選擇對中國在東亞戰場地位的影響有清醒的認識。同時，方注重內部取向的歷史觀，主張站在中國自身立場，從中國歷史延續性方面，從中國內在發

展的規定性方面，重新審視西方對中國的影響，觀察中西互動的複雜情形。在方法論上，方以中長時段的歷史考察為視角，提倡在更大的時空範圍內梳理歷史發展的脈絡，揭示了歷史事件的多元面相。筆者相信，方德萬的研究對我們研究抗日戰爭史乃至民國史都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

## 學運「去政治化」為何失敗？

### ● 程映虹

中國二十世紀的校園政治是一條貫穿中國現當代歷史的重要線索。對於這一條重要線索，一般讀者比較熟悉的是正面的敘述。黃堅立的《難展的雙翼》試圖梳理學運這條線索的另一面，並對國共的成敗貢獻提出一些思考。



黃堅立：《難展的雙翼：中國國民黨面對學生運動的困境與決策：1927-194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中國二十世紀的校園政治是一條貫穿中國現當代歷史的重要線索。在辛亥革命之後，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史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始於「學運」，終於「學潮」。

對於這一條重要線索，一般讀者比較熟悉，也是一般歷史教育比較重視的，是正面的敘述，即學生運動如何起源和發展，如何向威權提出挑戰，如何與其他社會運動相結合。當然，「正面敘述」的內容也包括學生如何受更成熟的政治勢力影響甚至操縱，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黨派鬥爭的工具，奉獻和犧牲換來的是為人作嫁。但這條線索的「反面敘述」則是一般讀者不太熟悉的。反面敘述的策略就是從威權政府的角度來考察學運的獨立政治傾